




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 邹逸麟 主编

● 杨伟兵 著

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 生态变迁(1659—1912)

 上海人民出版社

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
邹逸麟 主编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杨伟兵 著

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 生态变迁 (1659—1912)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杨伟兵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邹逸麟主编)
ISBN 978-7-208-07878-9

I. 云... II. 杨... III. ①土地利用—研究—云贵高原—1659~1912②生态环境—研究—云贵高原—1659~1912
IV. F321.1 X32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6250号

责任编辑 曹培雷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 ·

邹逸麟 主编

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

杨伟兵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3.75 插页 4 字数 375,000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07878-9/K·1446

定价 40.00元

总 序

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成就,举世瞩目,在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效果。毋庸讳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耕地的缩减,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湖泊的淤浅,干旱区荒漠化、沙化的加速,以及城市化过程中,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严重等等环境恶化问题,也十分突出。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时难以避免的现象;有的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无知,采取唐突的措施所造成的后果;有的则是当政者为单纯追求政绩,不计后果,盲目开发引起的环境恶化。以上种种,都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过度索取或无序干预后所引起,其实质是人地关系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又往往并非一代人所造成的,而是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我们谈到人地关系时,所谓的人,并非自然人,而是社会人。不同时期的社会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不一样,对生产技术的掌握不一样,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一样;而我们所谓的自然环境,在历史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同一地区的自然环境,经过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再进而言之,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又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我们如果研究当今环境问题,或想在制定保护措施和政策上,有科学的根据,就有必要对我国环境变迁的历史背景作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我国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有较深刻的研究,而这种研究又必须从区域研究入手。

本丛书的组织和撰写,就是希望能在这方面尽力做些工作。但是,我国地域广大,要对我国全境作全面的研究,短时期内实在难以做到。所以,我们想先选择若干比较典型的地区,对近五百年来(主要是明清以来)人地关系的复

杂过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希望通过这些地区的研究,能够粗略地反映我国历史环境变迁的全貌。这就是本丛书编写的主旨。

淮河流域是我国南北自然的分界线,也是我国南北文化的过渡地带。黄河流域文化向南传播,长江流域文化向北传播,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会合交融,呈现了绚丽多彩、浑成敦厚的文化景观。这里气候适中,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从秦汉以后直至唐宋,淮河流域长期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农业生产在全国居重要地位,隋唐以来又是南北大运河必经之地,水运交通十分发达,人口集中,城镇林立,商品经济比较繁荣。北宋建都开封,皖北地区邻近京畿,其地位较前代更为重要。然而在12世纪20年代一次黄河人为决口,河道改由东南流,夺淮入海,直至19世纪中叶,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由山东入海,在长达7个世纪的时间内,淮河成为黄河的支流。由于黄河泥沙的淤积,淮河下游出口排水不畅,洪水季节壅塞成灾,洪灾以后又有旱灾,从而造成皖北地区成为水旱灾害频发区,明清以来尤甚。这一偶然黄河改道事件,竟一改淮河流域人民的命运,实始料所未及。近五百年来,皖北地区的人民深受水、旱、蝗灾轮番发生之苦,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在此期间,历代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明清两代也曾对皖北灾害地区推行过一系列赈恤的荒政措施,以求社会的稳定。但赈灾的力度和效果又与当时的国家财政、吏治清明有关。因此,在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赈灾效果,往往是杯水车薪,难以使当地人民完全摆脱艰难的困境。而当地人民为了生存,不免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沿袭成俗,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例如青黄不接季节,外出讨乞,竟成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民风,其悲惨的命运,可以想见。《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一书,即对五百年来皖北地区生存环境恶化和人们如何采取应对措施,作了十分细致的研究,直至今日,皖北地区仍然是我国灾害比较频发、经济比较落后、广大人民生活比较贫困的地区。历史的研究,能否给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太湖流域是宋代以后,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明清时期更为国家财政收入的渊藪。物殷财阜,人才荟萃。这个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在自然方面,一是地处长江三角洲,水系发达,河湖港汊密布,水资源十分丰富,但又因东临海域,沿海一带地势高亢,故又是旱涝潮灾频发的地区:二是区内呈现了低地、山丘、冈身、湖荡、滨海沙地相间的复杂的地理景观,人

们为适应这样复杂的地理环境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在人文方面：一是人口密集，耕地紧张；二是产业多样化：水稻、蚕桑、植棉、茶业以及家庭手工业十分发达；三是商品经济繁荣，市镇林立；四是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引起“乡绅”阶层的兴起及其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重要作用；五是历史发展形成的行政空间插花错壤与调整，是本区行政管理上的麻烦事。在自然和人文环境如此复杂的地区，却能在宋代以后的近千年时间里，始终保持全国经济领先的地位，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地方政府、士绅、民众三个层次的力量，在自然和人文复杂的环境下调整矛盾、取得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形成一个相对和谐的社会。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一书的作者为我们作了深入和细致的分析。

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无论从自然或人文环境而言，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位于长江中游，自地质时期以来即为沉降地，境内河流纵横、湖泊密布：湘、资、沅、澧四水汇集洞庭并与长江相通，汉江自西北向东南汇注长江，江汉湖群密集，构成“水乡泽国”之河湖水系网。长江干流自宜昌以下，曲流发育，河道振荡无定，沙洲林立，河汊港湾变化很大。因此，在历史时期，其开发的进程要晚于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唐代以前，地广人稀。宋代以后，因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明代开始江西人口的大量移入，低洼沮洳之地才得次第开发。在这个地区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人们，为适应当地自然条件，需要付出极大的劳动。低洼沮洳之地，必得先筑堤垸才能耕种，围湖造田成为当地农耕地的特色景观。防止长江的侵蚀，修筑沿江大堤也是当地人民又一重大负担。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安居定业。由于该区光照时间充足，十分有利于鱼类及其他水生生物的生长繁殖，水产资源极其丰富。所以开始时是渔业在两湖地区占十分重要地位，以后河湖淤废，粮食种植业成为主要产业。明代开始，“湖广熟，天下足”之谚，即其现实反映。清代两湖地区成为全国粮食生产基地，为当时社会提供了大量粮食。然而围湖造田后，因蓄水失所引起的洪灾，因修堤经费引起的公私矛盾，以及土客之间产业之争，这五百年来，两湖地区人地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相互纠缠的种种矛盾之中。《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一书，围绕着这五百年来两湖平原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给我们今后该地区的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的启示。

云贵高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地理单元。就自然地理而言，云贵高原不是

简单的统一高原地貌,而是山地、低丘、宽谷、浅盆相间,河流、湖泊密布,呈现极为复杂多样的地理景观;就人文地理而言,汉唐以来,是多种族别所谓“西南夷”的少数民族所居地。唐宋时期还建成过独立的南诏、大理国。元代以后直属中原王朝,于是大量移民开始进入。明初洪、永年间,为开展军事戍边和屯田,对云贵高原进行大量移民,粗略统计,约有三四百万人口,最终成为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区。随着大量和多种民族的移入,对当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重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首先,移入的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人,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商)屯,农业耕地成为平坝地带最主要和分布最广的土地利用形态。其次,由于中央王朝的势力深入云贵高原,林木的开采,成了云贵高原另一重要产业,原始森林中珍贵木材遭到严重破坏。再次,以铜为主多种金属矿业的开发,成为中原王朝掠夺的主要资源。但是原居于山区、半山区土著居民,仍处于“刀耕火种”、“采集渔猎”落后的经济状态。生产的不平衡、生态的多样性,是明代云贵高原土地利用的显著特点。进入清代,康、雍年间“改土归流”后,汉民又一次大量进入,垦殖进入山区,大大推动了山区的农业开发,采矿业也进一步兴盛,林木业给当地不少人带来丰厚收入,晚清以来鸦片种植又成为云贵地区另一产业。总之,在这三百年内,云贵高原土地利用方式有过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当地资源、自然和生态系统中有明显的反应。对这种变化背后自然和人文驱动因素的探讨,是我们今天认识云贵高原生态环境的现状的钥匙。《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在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新疆塔里木盆地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沙漠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但是它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人类活动十分活跃。但在清代以前,在不少绿洲地区,众多古代人类聚落被废弃,民国时期这里又废弃了大量耕地,而清一代这里的绿洲却基本稳定,这就为我们研究沙漠绿洲生态环境的变迁,找到了一个十分典型的地区。以往的研究认为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的废弃主导因素是水资源短缺。但是《清代至民国时期农业开发对塔里木盆地南缘生态环境的影响》一书的作者,通过民国时期大量的社会生产、生活以及耕地废弃的历史档案资料进行系统的过程式分析研究,基本复原了这一时期该地区耕地大面积撂荒的社会与环境诱因之间的相互耦合关系。作者认为人口快速增长,垦荒扩耕加速,自然生态资源失衡,是造成绿洲耕地大面积撂荒的根本原因。作者提出了“绿洲废弃规律”,认为“绿洲的

废弃与农业开发强度成正相关”，“耕地的大面积撂荒和废弃与人口压力成正相关”。这种人地的耦合关系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后治理沙漠绿洲地区提供重要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国。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地球上的各种地貌，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类型。因此地域之间的极大差异，是中国地理环境的重要特色。要治理好这样一个国家，对国情、地情没有深刻的了解，就不可制定出科学的政策，否则不仅会遇到种种困难，还可能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本丛书的编写，就想解剖几个典型地区，以求从中能得到一点启示。虽然上述五个地区还难以覆盖全国，但有其一定的代表性，则是可以肯定的。

虽然各书的作者，都曾经对这一地区经过较长期的研究，均出版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论著。但学术无止境。今天各书的问世，仍然可能存在不全面、不细致、不深入的地方，有的结论未必能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同时也希望这种研究，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期盼有兴趣的同行也能加入这个研究的行列，将我国各地的历史地情搞搞清楚，让我国的学者和广大民众对我国的国情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当政者在制定今后发展的规划、政策中，能从中取得一些借鉴。

邹逸麟

2008年6月

序

云贵高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地理单元,这种复杂体现为一种自然的混杂,也显现为一种人文的多元。从自然地理来看,云贵地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高原地貌,云贵高原的南部地区的黔南、黔西南、滇西南、滇南、滇东南地势、海拔和地理纬度都较低,有许多地热条件较好的平坝,而海拔较高的滇中地区高原上既有平坦的高原平坝,也有许多低矮的丘陵地貌,贵州高原上平坝相对较少,而滇东北、黔西北、黔东北地区垂直高差明显,滇西北地区为高寒高原。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人文的多元也很明显。云贵高原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历史上曾为氐羌系统、百越系统、苗瑶系统、百濮系统各民族的生息地。汉晋以来,汉民族开始进入开发,云贵地区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政区,但唐五代两宋时期,又相继为南诏、大理等地方民族政权管辖。元代以来云贵地区虽然一直为中央政府设立的一级政区管理,但多民族的背景下汉民族的进入不仅无法改变这个地区文化的多元性,反而使区域内文化更加繁富多彩。但我们要知道的是,历史上留给我们记载这个地区的传世文献并不如记载中原地区的传世文献系统丰富,而区域文化的相对落后更使我们对这个地区的前期研究不够。正是因此,我们一直认为研究西南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但同时也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然,怎样研究云贵高原地区,我们一直在探索之中。杨伟兵博士的《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一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十分有益的探索。

《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首先从理论上对生态系统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的讨论,然后在上篇中对清代云贵高原的经济与社会作了具体的分析,使我们对清代云贵高原地区的社会经济背景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全书的核心在于中篇。中篇首先从耕地、

矿业用地、其他用地三个方面对清代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基本情况作了具体分析,然后以三个地理环境不同的典型经济开发区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使我们对云贵高原上不同地区土地利用的差异有了全面深刻的了解。全书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区域土地利用的变化的驱动因素的研究和生态环境变化的生态响应研究。作者在中篇中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中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原因作了较系统的讨论,这种讨论对于我们分析这样一个自然和人文都十分复杂的云贵高原地区是十分有益的。作者在下篇中对土地利用而来的环境变化生态响应的研究十分有意义。一方面像云贵高原这样的地区土地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由于自然和人文背景的内外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其他区域并不完全一样,显然不是一个简单地土地利用破坏生态环境的结论能够说清的;另一方面探索这样的变化而来的传统社会应对及其机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本身,可能会使我们对传统社会的经济管理和文化传统关系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综观全书,纲目设计循序渐进,逐渐分理,读之可使人一气呵成。

特别要指出的是书中时时闪烁着理性分析的火花。比如中篇在讨论云贵地区册载耕地时认为:“整个清代云贵地区册载耕地亩数大都反映赋税取向,或者说是赋税及其征收制度体系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尚难成为单位面积的直接数据——不过册载耕地数字的分布上变化,对于考察地区农业发展状况仍是重要的参数之一。”这种客观理性的认识对于中国古代册载耕地数意义和正确利用来进行区域历史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又比如中篇在分析农业经济及其用地结构时分析了黔东南地区林粮间作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现了一个传统社会中区域地缘、地形地貌、文化传统对于传统“主谷制”背景下的区域开发的修正的个案,对于我们今天深刻理解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又如,中篇中分析“矿业及早作经济区”时不是简单沿用其他地区高产旱地农作物垦殖破坏生态环境的角度,而是充分考虑了云贵地区开发与其他地区的时间差问题,正确分析了清代云贵地区农业开发过程中玉米、马铃薯对农业结构和生态环境影响的过程,而且考虑到清代云贵地区矿业开发地区劳动力分散对农业开发的影响。再如,书中在讨论影响土地利用的驱动因素时有许多有益的探索。这在讨论技术影响方面特别明显,讨论到清代高产旱作农作物时认为,在清代并没有在云贵高原地区马上产生“革命性”的结构影响方面,指出了云贵地区的开发由于自然环境和开发过程上的特殊性。同时

作者也考虑到山地粒籽种植业由于水利小型化和田土分散化的局限性,从而对清代云贵地区山地垦殖粒籽种植业的意义产生怀疑。这些工作都体现了作者的在积极地独立思考。这些研究对于以前的研究而言,都是一种进步。在下篇中作者对于环境变化的社会应对及其机制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就传统社会来看,对于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认识走过的理解过程是一个从现实的感性到科学的理性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区域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这种过程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作者对于水利应对与管理、植林及山林保护的文献发掘和讨论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十分有意义的。这种讨论不仅对云贵地区而言具有开创价值的,而且对于整个中国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总之,《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是一部在西南历史地理研究领域特色鲜明而具有开创价值的著作。

伟兵博士生于云南,早年在西南师范大学随我一起研究西南地区历史地理,后考入复旦大学随邹逸麟先生攻读历史地理学博士,并留校工作,虽然久居沪上繁华之都,但对西南区域的历史地理关爱仍然不变。值此《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出版之际,伟兵博士嘱我为之作序,显然,不论出于师生之谊还是出于对西南区域的共同关怀,不论是对伟兵严谨学风认同还是对共同感兴趣的题目的关心,我都十分高兴为之作序。

应该看到,从总体上来看,由于西南地区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和文献记载的缺乏等因素,我们对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全国的学界同仁都在不断努力,力争对西南区域的历史地理研究有新的气象。《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12)》是伟兵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深入,博士毕业这些年,伟兵继续在研究云贵地区历史地理。相信他在不久的将来,通过在历史人类学方法上的新突破,新的论著又会给大家带来更新的气象,为研究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作出更大的贡献。

蓝 勇

2008年春节于四川绵阳涪江畔

目 录

总序	1
序	1
绪论 生态系统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1

上篇 清代云贵高原的经济与社会

第一章 云贵高原的生态环境与开发基础	31
一 自然地理环境	31
1. 地文系统	31
2. 土壤及物质资源	36
3. 自然灾害	42
二 经济社会及其发展	47
1. 元代以前的经济与社会	47
2. 元明时期的地区开发	52
3. 人口增长下的土地利用	59
第二章 清代云贵高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72
一 政治和社会形势	72
1. 地方行政与疆域调整	72
2. 经济恢复与地方社会	80
二 改土归流	84
1. 问题的由来	84

2. 改土归流活动	86
3. 地域生态变迁	98
三 移民开发	102
1. 农业垦殖	102
2. 矿业开发	106
3. 商品经济:林木和鸦片	109

中篇 清代云贵高原土地利用景况

第三章 清代云贵高原土地利用主要分布	119
一 耕地	119
1. 构成与类别	119
2. 数值与分布	126
二 矿业	138
1. 规模与分布	138
2. 土地利用变化	147
三 其他用地	154
四 小结	169
第四章 清代云贵高原土地利用局地事例	171
一 基本经济区:滇中盆坝及其周边的水利与环境	171
1. 水利与农业环境	172
2. 人口损耗与耕地变化	187
二 山林经济区:清水江流域的生产与土地结构	195
1. 移民垦殖与耕地变化	195
2. 农林经济及其用地结构	201
3. 土地生态—生产结构的局限	206
三 矿业及早作经济区:滇川黔边区的开发与生态	211
1. 农业垦殖与耕地变化	212
2. 矿业与山地生态	220

四 小结	235
第五章 清代云贵高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	237
一 自然因素	237
1. 常态制约	237
2. 灾变制约	242
二 人文因素	245
1. 社会变革	246
2. 田赋制度	254
3. 矿政因素	263
4. 人口因素	269
5. 技术因素	281
6. 民族文化	293
三 小结	299

下篇 清代云贵高原环境变化生态响应

第六章 清代云贵高原生态变迁的区域响应	303
一 自然环境变化的区域响应	304
二 社会应对及其机制	308
1. 水利应对与管理	309
2. 植林与山林保护	318
三 土地利用与生态演变关系的认识	329

图表目录

图 1 云南生态物群基本类型和垂直分布	39
图 2-1 清前中期云贵两省行政区形势	76
图 2-2 清代云南地区册载耕地数量变化	104
图 2-3 清水江上的放排	112
图 3-1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云贵地区耕地分布	135

图 3-2	光绪十年(1884 年)云南省耕地分布	136
图 3-3	清代云南铜厂分布	141
图 3-4	清代云南银厂分布	142
图 3-5	1917 年东川府产矿地分布图	152
图 3-6	1917 年大理府道路	161
图 3-7	清代镇远府城景	168
图 3-8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云贵地区主要城镇分布	169
图 4-1	清代云南水利工程分布	180
图 4-2	民国三十六年(1947 年)前后滇池地区灌溉分布	181
图 4-3	大理地区盆坝分布	183
图 4-4	云南宾川县旧时修筑的“地龙”(出口)	184
图 4-5	黔东南地区杉木“皆伐”景观	205
图 4-6	黔东南山林契约反映的光绪年间污堵溪地区山林分界	206
图 4-7	贵州黔东南地区林业契约包样	209
图 5-1	清代京铜运输路线	268
图 5-2	毕节沔鱼河民国时期遗留至今的筒车	289
图 5-3	贵州锦屏亮司水车群	290
图 5-4	云南红河州梯田景观	291
图 5-5	贵州黔东南山地梯田	292
图 6-1	云南山地侵蚀景观	305
图 6-2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宾川州《为照例立坪勒石以杜后 患事》碑拓片	310
图 6-3	民国五年(1916 年)云龙长新大达村水利碑刻拓片	314
图 6-4	云龙县炼登乡道光年间乡规民约碑刻	323
图 6-5	锦屏县城飞山庙附近碑刻	328
表 1-1	云南省坝子(盆地)数量和面积统计	33
表 1-2	云贵高原主要土壤分布及利用	37
表 1-3	云贵高原立体农业分布	39

表 1-4	元代云贵高原主要民族分布与社会经济状况	55
表 1-5	元世祖至元年间云南地区册载军民屯田数量及其分布	63
表 1-6	嘉靖《贵州通志》所载明代初期屯田数	67
表 2-1	清前中期云贵地区府级建置变动	74
表 2-2	清前中期云贵地区卫所建置变动	77
表 2-3	清代云贵高原主要民族分布与社会经济状况	82
表 2-4	清代云贵地区土司降废情况	87
表 2-5	清代清水江流域木行及其经办商帮	111
表 2-6	有关晚清时期云贵地区鸦片种植面积的各类估算	114
表 3-1	《古今图书集成》载康熙朝云贵两省各府田地数	128
表 3-2	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云贵两省各地册载耕地数量及其 所占比例	132
表 3-3	道光、光绪两朝云南各地册载耕地数量、所占比例及 其增长率	134
表 3-4	清代云南铜厂与产量分布	143
表 3-5	清代云南银厂与产值分布	144
表 3-6	清代云南鼓铸设局情况	148
表 3-7	清末民初大理县(洱海坝区)农村聚落分布及其等级	162
表 3-8	明清镇远城码头、巷道及水井布局	166
表 4-1	明清时期大理坝区水利工程	175
表 4-2	清代云南主要水利工程分布、类型和数量	176
表 4-3	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今大理各地区耕地构成与数量 分布	188
表 4-4	清代今大理各地区耕地亩数变化	189
表 4-5	清代云南各府鼠疫死亡人口及其比例	190
表 4-6	清代昆明(郊区)、安宁两县鼠疫流行被灾村镇数量与人口 死亡状况	193
表 4-7	道光初期黔东南客民职业状况	198
表 4-8	乾嘉时期册载黔东南地区田地数	199